

作为“历史人类学派”学者, 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中国历史学教授宋怡明

立足地方实况和地方文献, 通过田野调查, 梳理“由下往上的历史”。

从上往下的历史“忘记”了普通民众和日常生活, 没有意识到

日常生活巨大而复杂的力量如何作用于政治和历史。

宋教授认为, 来自底层的对策, 不应该被理解为是对政策的侵蚀和破坏。对策非常复杂, 它们构成了历史的另一面, 而恰恰是这些来自底层的对策, 决定了政策实行的可能性。这正是为什么“历史人类学派”关注日常生活, 关注由下往上的历史。

宋怡明教授 (Stephanie Mitchell/Harvard Staff Photographer提供)

文@应磊

宋怡明教授通过田野调查

由下往上看历史

南大配合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成立10周年、中华语言文化中心成立20周年举行庆祝活动, 将从3月21日至22日举行“海外华人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方法、理论、视域”国际学术会议。

来自中国、美国、英国、日本、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意大利、土耳其以及新加坡等地的研究学者将齐聚新加坡, 共同就海

外华人研究课题进行交流。

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中国历史学教授宋怡明将在开幕式上以华语发表主题演讲《明代军事制度和东南亚华侨史: 一些推论》。另一位主题演讲人是来自耶鲁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学系的石静远教授, 她以英语演讲的讲题是《弱中显强: 华语语系结构运作中一种特殊的纽带关系》。

会议开幕式定在3月21日上午9时至12时举行, 届时将提供同步通译服务。

国际学术会议开放给海外华人研究课题有兴趣的学者和公众, 会议详情及报名网址是: <http://www.cclc.hss.ntu.edu.sg>

会议地点为南大校园内的南洋高级培训中心 (NEC; 全称为Nanyang Executive Centre)。

问与答

◆应磊 ●宋怡明教授

◆宋怡明教授, 你是加拿大人, 最初是怎样的机缘, 触发了你对中国的兴趣?

●在我十二岁那年, 我父亲要带我去武汉讲学——他是大学教授、工程师——于是我第一次踏上中国, 那时是80年代初。不过, 那只是一个不经意的开始。要说我真正对中国发生兴趣, 是在高中毕业后, 我决定花一年时间去旅行。那时拿一年作为gap year (即指高中毕业后用一两年时间到海外短期工作或旅行) 还是挺不寻常的。我投了几百封信, 给各类非政府组织, 最后获得三个工作机会, 分别在肯尼亚、印度和中国——确切地说, 是中国武汉。我选择了中国。回头看, 这个选择改变了我日后的人生。

◆一个高中毕业生应该还不到20岁, 当时你就独自去中国旅行?

●对, 那年我16岁, 我父母居然同意我这么做。现在我也做了父亲, 想想真是不可思议! 但我的中国之旅很顺利。重要的一点是, 我的薪水很高, 每月有250元人民币, 相当于一个大学教授的月薪。很快地, 我就攒足了1000元, 于是我辞掉工作, 在中国各地旅行, 从武汉到拉萨, 从乌鲁木齐到北京, 一路搭便车, 搭得最多的就是卡。就这样, 我跑了很多地方, 感觉非常新奇, 对中文也越来越感兴趣。

◆那时的中国给你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中国人的慷慨给我印象最深。只要我提到“白求恩”, 有一半时候, 我手上的那碗面条会变成店家的免费赠送! 毕竟在80年代中期, 独自在中国旅行的外国人并不多。还有一点令我印象深刻, 那就是有一种莫名的兴奋空气, 四处弥漫。人民公社解体了, 文革结束了,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没人说得上来, 但人们心里清楚, 变化即将来临。

◆这趟旅行结束, 你回到故乡, 进入多伦多大学读本科, 是主修中国研究吗?

●那倒不是, 我本科主修国际关系, 但同时选修中文课。学校要求掌握一门外语。作为一个加拿大人, 那时我学习法语已经十年了, 我想学点别的, 于是就选择了中文。结果, 我对中文的兴趣超过了我想国际关系的兴趣。那时我总是随身带着一叠卡片, 一面写的是中文词汇, 另一面写着英文注释。对了, 我在多伦多大学中文课时, 和大山是同班同学。

◆大山! 你提醒了我, 大山是加拿大人。他在中国是家喻户晓的明星。(编按: 大山是中国第一位外籍相声演员)

●是啊, 加拿大人想到中国, 往往也会想起大山。有同胞开玩笑说, 你做到哈佛教授有什么了不起, 看看人家大山! (笑) 本科毕业以后, 大山和我都申请到了奖学金, 他去了北京, 我去了台北。这恐怕就是我们俩命运的差别。

宋怡明教授与孩子摄于金门岛上庙宇前。



(宋怡明教授提供)

冷战中的两个岛屿——金门与新加坡

2001年9月, 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中国历史学教授宋怡明受邀到台湾的金门岛参加国际研讨会, 会议才刚结束, 震惊全世界的美国九一一事件发生, 他的行程因而滞留而滞留金门, 对金门有了最初的观察。之后, 他到金门进行田野调查, 最终完成了研究金门人的学术专著“Cold War Island: Quemoy on the Front Line” (《冷战中的岛屿: 前线的金门》)。

根据宋怡明教授的研究, 国民党在1949年撤退到台湾后, 金门岛便成了冷战时期的对峙前线, 金门人的日常生活因此受到地缘政治的牵制和影响。

另一方面, 大量金门人移居新加坡, 金门和新加坡的历史因此是相互连接的。两地在很多方面还可对比, 例如两地都曾无可避免地被卷入全球冷战, 必须在复杂的国际局势下寻出路。

宋怡明教授29日公开演讲

宋怡明教授的专长是明代以来的社会文化史, 善于通过田野调查, 立足地方实况和地方文献, 由下往上看历史。他也是陈六使中华语言文化教授基金访问教授, 已受邀为本月21日举行的“海外华人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国际学术会议发表专题演讲。

宋怡明教授外将在本月29日以华语演讲《冷战中的两个岛屿——金门与新加坡》。这个活动是由联合早报、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及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联合。

“冷战中的两个岛屿——金门与新加坡”

●日期/时间: 3月29日 (星期六) 下午2时30分至4时

●地点: 报业中心礼堂 ●报名热线: 63192332

◆真没想到还有这么一段。

◆我本来只打算在台大逗留两个学期, 但因为学习中国历史的兴趣越来越浓, 一待便是两年。后来因为获得罗德奖学金 (Rhodes Scholarship), 才转去牛津读博士。到了牛津没多久, 因为我的导师科大卫 (David Faure) 的鼓励, 我又重返中国, 投入田野调查。那是在90年代初。这一切看起来仿佛事出偶然, 但对我个人而言, 尤其对我此后的治学道路而言, 却有重大的意义。

◆这是你成为一位历史人类学家的转折点?

●没错。90年代初, 一个新的历史学派——和南方中国的研究密切相关的华南学派——在中国兴起, 也就是现今日益为人所知的“历史人类学派”。这一学派的基本立场之一, 是立足地方实况和地方文献, 由下往上的历史是可能的。这显然有别于从上往下的历史。所以, 在方法上, 田野调查对历史人类学家而言至关重要, 通过田野调查厘清农村生活和农村社群的组织, 搜寻民间文献, 这和书斋里的历史学家又很不一样。这一学派的兴起, 和当时中国民间历史记忆的复苏有很大关系。文革结束后, 宗族认同复兴, 文革时期被藏起来的族谱纷纷浮出水面, 尽管与此同时, 中国在经历大规模的城市化。这段对历史记忆的重拾和反思, 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我的学术人生。

◆你提到族谱。你的博士论文及第一本学术专著“Practicing Kinship: Lineage and Descent in Late Imperial China” (《实行家族: 晚期中华帝国的家族》) 便是聚焦家族史。你为什么会对族谱的研究特别感兴趣?

●我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福州一带的若干家族, 包括一户陈姓家族, 这家出了一个陈宝琛, 是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单以我关注的福建来说, 一个村子里, 几十口人都属于同一个大族, 这让我感到非常好奇。我是一个匈牙利难民家庭的后代。1956年匈牙利十月事件后, 我父亲流亡到加拿大。你可以想像, 我在个人经历里不曾见过这样庞大而复杂的宗族体系。在我的第一本书里, 我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 宗族关系在中国社会里的重要性人尽皆知, 那么, 族谱关系究竟为什么重要? 难道是中国人的DNA与众不同?

◆你的答案是什么?

●我想, 人们常常忽略了一点, 即对宗族关系的敏感有其自身的历史。我的答案是, 在许多情况下, 宗族关系作为一种社会组织的手段非常有用。福州是一个突出的例证, 不过这个结论有广阔的适用范围。举例来说, 我在研究中发现, 80%的福建人以及100%的台湾本省人, 都声称他们祖上来自同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在河南光州一带。显然这是不可能的。然而, 问题不在于不可能, 而在于于这样的意识对他们很重要。从唐代到明代, 为了证明自己是中国人, 你必须要有族谱, 你的族谱必须能够上溯到某一个源头。换句话说, 祖先

学界长期忽略地缘政治对金门人影响

◆你的第二本学术专著“Cold War Island: Quemoy on the Front Line” (《冷战中的岛屿: 前线的金门》), 聚焦转向冷战时期的金门。你最初是怎么开始关注金门的?

●那是在2001年9月, 我受邀参加一个在金门举行的国际研讨会。当时金门虽然已经解禁, 但在外人眼里, 还是一个颇神秘的地方, 因此金门政府致力于推动对外交流。谁知会刚开, 九一一接踵而来, 我的航班被取消, 一时无法飞回北美。研究建筑史、后来在金门大学执教的江柏炜教授便带我参观金门。金门没有经历文革, 可以说, 是闽南建筑保存得最好的地方。不仅如此, 金门人流散到东南亚各地, 比如新加坡, 新加坡1870年便建立了金门会馆。以中华民国来说, 金门和马祖是仅有的两个侨乡, 而且与海外华人社群联系密切。那次滞留让我意外地发现了金门。我的第二本书便视这座岛屿为冷战的缩影, 探讨金门人的日常生活如何为地缘政治的力量所左右。

◆请举个例子。

●我在金门做田野调查的时候, 在一间乡公所, 发现了几塑料袋冷战时留下的文件, 都是“乡”这一级的行政记录。这很难得, 因为大多数冷战时期的地方档案在戒严时都被销毁了。这里举个例子: 当时因为高度防备间谍, 任何能在水面上漂浮的东西, 包括篮球、轮胎、脚踏车内胎, 居民都要去乡公所注册。乡公所定期派人检查, 看这些东西还在不在; 如果不在, 那麻烦就大了。我们知道, 冷战是一场非常不一样的冲突, 但就像其他战争, 它深入渗透百姓的生活。莫斯科、华盛顿、北京、台北, 金门人的日常生活为这些发生在远方的政治所支配。令人遗憾的是, 研究金门的书有上百本, 但地缘政治对金门老百姓的影响及冷战与日常生活的层面, 一直被学界忽略。

◆为什么会出这样的局面?

●我再举个例子。冷战时期, 公共卫生是一桩大事, 因为国民党担心, 如果驻金门的部队发生传染病, 共产党会趁机打过来。当时金门闹鼠患, 国民党为了, 这都是金门人不讲卫生造成的; 他们不知道, 导致鼠患的真正原因是军队的粮食贮存, 地洞里屯了好多大米, 无异于老鼠的天堂。接下来, 国民党在金门展开灭鼠运动, 制订了指标, 要求居民每周上缴一定数目的老鼠尾巴, 作为灭鼠的凭据, 不然便要受罚。从百姓的角度, 人们的担心变成, 要是老鼠都被抓走了怎么办? 还怎么应付指标? 于是人们抓老鼠, 往往剪了尾巴就把老鼠放了; 或者只抓公鼠, 不抓母鼠。后来, 甚至出现了交易老鼠尾巴的市场。显然, 这场运动以失败告终。20世纪的威权政治, 在对人性的理解上也是彻底失败的。



宋怡明教授小档案

Michael A. Szonyi

- 多伦多大学学士, 牛津大学博士
- 曾在麦吉尔 (McGill) 大学和多伦多大学执教
- 2005年至今执教于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 任中国历史教授。研究兴趣侧重中国东南部地方史、中国民间宗教史及海外华人史
- 主要著作有“Practicing Kinship: Lineage and Descent in Late Imperial China” (2002), 《明清福建五帝信仰研究资料汇编》(编著, 2006), “Cold War Island: Quemoy on the Front Line” (2008), 以及“The Cold War in Asia: The Battle for Hearts and Minds” (合编, 2010)

和族谱的构建对于社群认同极为重要。谁都可以记录族谱, 但只有中国人真的那么做了! 亲族关系犹如一套语言, 中国人深知, 这套语言的运用与社会的实际操作密切相关, 比如说, 明代的赋税体系便建立在亲族关系的基石上。这正是为什么我的书取名《实行家族》。亲族关系并不凭空存在, 我想强调的是, 亲族关系是在日复一日的社会实践中构建出来的。

◆你当年为博士论文做田野调查的村子, 今日面貌如何?

●噢, 那个村子已经不存在了! 那一带已经完全城市化了。所以, 我常常感到自己很幸运, 像我做的那种对中国农村的田野调查, 再过二三十年, 恐怕不复可能。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经历了巨大的变化, 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故事之一; 一个有多元面向的复杂的故事。一方面, 传统农村社会迅速消失, 但与此同时, 我也亲眼目睹新一代人如何重塑历史记忆, 复兴传统。



宋怡明教授在金门进行田野调查。(宋怡明教授提供)

◆这算是一个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故事。你刚才说到, 历史人类学注重由下往上的历史, 如此看来, 你的两本书虽然题材很不一样, 但在取径和方法上是一致的。

●正是。所谓下有对策, 我们不能简单地以为, 这些来自底层的对策是对政策的侵蚀和破坏。这些对策其实是非常复杂的, 它们构成了历史的另一面。恰恰是这些下面来的对策, 决定了政策实行的可能性。这正是为什么我关注日常生活, 关注由下往上的历史。

目前绝大多数研究金门的国际关系学者, 着眼点仍在于从上往下的历史。他们“忘记”了普通民众和日常生活, 是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日常生活的巨大而复杂的力量, 这样的力量又如何作用于政治和历史。再举个例子, 不久前习近平会见连战, 这当然是海峡两岸关系史的一件大事, 但是, 海峡两岸关系并不单单由政治家定夺, 普通民众也参与其中。在历史学家看来, 台商、跨海联姻的家庭, 还有把他们联系的纽带带到大陆进来的台湾人, 他们都在这段两岸关系的发展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